

《钟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学》《福建文学》:

# 探究当代人的精神岩层

□罗文婷

■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模仿,文学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文学世界,让读者在其中捕捉、放大现实的光亮

■从时代大潮到细小日常,从介入现实到形式探索,作家们以丰富的文学表达展现着多元的时代风貌,整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艺术性、在地性特点

2024年早春,《钟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学》《福建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在文学苗圃持续耕耘、各生花。我们看到,不同代际的作家们深入枝繁叶茂的现实生活,以鲜活的日常经验滋养文学创作,书写新时代的万千气象。于刊发文学佳作之外,各期刊还不忘引领地方风尚,努力在栏目策划上推陈出新,实现创作与理论、文学声音与社会议题并重的多声部合奏。

## 记录时代的生命律动

记录时代新声、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文学的使命所系。不同于前些年许多作品对宏大话语、时代旋律的正面强攻,作家们对时代命题的回应落在了具体的生活细节与鲜明的人物群像中,从而赋予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写作的崭新面貌。陈克海《深的山》(《湖南文学》2024年第2期)是一部紧跟时代热点、贴近生活现场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采用女性叙述视角,通过安慕瑶从大城市回到偏远乡村的苦难到开直播、拍视频来记录日常的积极转变,思考留守女性重获新生的可能,同时将年轻人回乡创业、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等时代议题融入文本之中,成功捕捉新时代农村生活的新变化与新体验。

与时代精神建立联系的,还有海飞的长篇小说《大世界》(《江南》2024年第2期)。故事发生于1944年,一个叫朱三的男人,在大世界变了三年戏法。这一次,他的戏法是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代替他潜伏在日军军警宪兵中。海飞以“谍战”的险象迭生建构文本的外拓张力,同时又以人物对革命事业的重新认识丰富小说的精神内核。在作者笔下,革命变得具象化,指向的是朱三、陈昆、唐书影、潘水等热血青年的理想信念以及傅灿灿、李电影、吕大鹅等众生相的剪影。

与此同时,亦有作家于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探究当代人的精神岩层。胡性能的中篇小说《去县城的路上》(《钟山》2024年第1期)塑造了当代文学作品中少见的殡葬师形象。在主人公去往县城的路上,当初为何离开县城的隐秘逐渐浮现,作家一步步指引我们去了解一个殡葬师内心的恐惧,以及他选择做这份职业的人生前史。

《福建文学》2024年第2期重点推介“90后”作家熊生庆的中篇小说《最后一刀》。小说塑造的刀客熊十九,颇有金庸式武侠人物的传奇气质——无意闯入苗寨,成为苗刀传人。但小说家为这位奇人准备的不是

是快意江湖,而是亟待解决温饱的现实俗世。因此,刀客与杀猪匠的双重身份,让熊十九盘旋在刀尖之上又跌落回市井之中。传奇与日常的一次次对撞,促使熊十九这个刀客形象焕发了有别于金庸式武侠人物的新质。

有人关注无名之辈,也有人聚焦世俗奇人,李杭育的短篇小说《二花》(《江南》2024年第2期)则将目光投向一个即将奔五却还“恋爱脑”的中年女性,讲述其为情人还赌债的荒唐行为。作家以一个女性的情感经验展露一地鸡毛的负重人生,童年那条没捞起来的红裙子,构成其一生的隐喻:那是女性未完成的自我。

## 探索形式的多样景观

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模仿,文学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文学世界,让读者在其中捕捉、放大现实的光亮。基于此,小说家们以形式的巧妙和题材的出新,调动读者的阅读感官。孙频的中篇新作《雪隐于雪》(《钟山》2024年第1期)是一场关于作家与文学世界的时空对话。孙频设置了两个不同的作家角色,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慕晓的父亲。在子一代的视角里,两个父亲陷入作家角色的偏执中,分不清文学与现实的边界,犹如滑稽的堂·吉珂德以写作为长矛,刺向名为幻想的风车。《雪隐于雪》是孙频近年来对作家身份建构与探索的又一力作,书中的作家藏匿于由文字构筑的世界里,孙频本人则长期在凝视作家这一职业的过程中进行审视,于文本内外完成对作家身份的塑形。

文学新人李嘉茵的短篇小说《波密人的历史时间》(《钟山》2024年第1期)是一个关于虚构的故事。小说开头为读者呈上了一份关于东南亚原始部落的田野调查报告,不过其真实性很快就被小说家否认:这不过是“我”的虚构。在这之后,“我”却意外探访到位于热带雨林中的波密人聚落遗址。波密人身处理性文明的另一面,这里火山喷涌、地震频发,当下发生的一切瞬间即为历史。于是我们发现,被人类定义为“时间”的概念不过是宇宙永恒秩序的幻觉。在这场由作家编织的虚幻游戏里,竟让读者刹那有了丧失时间维度的奇妙体验。

刘汀的中篇《春风吹又生》(《山花》2024年第2期)则将大自然与虚拟游戏这两个看似不相及的话题结合,是一次探索意味浓厚的美学实验。小说主人公“我”有着草原之子与游戏开发者的双重身份,这一设

定赋予文本更广阔的言说空间。《春风吹又生》不仅思索了人为物力对生态破坏的传统命题,还引向了另一种思考:当真实的草原变成一堆数字代码后,人类还能在现实世界里留存什么。

## “地方”的在场与文学新人的勘探

近年来,随着“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等概念成为热点文学现象,对于本土派别的命名与打造,便成为各大文学期刊确认“地方”在场的有效手段。《江南》以“文学新浙派”召唤文坛新风景,2024年第2期发表的《致敬、传承、确认与未来》,可谓是对这一新口号的阶段总结。《福建文学》2023年第3期尝试提出一个新的散文概念——采风体散文,即作家们受地方之邀参加采风活动写成的散文。本期以“古田库区行”为名,集中刊发多位福建作家的采风散文,以期对这个概念赋形。

《湖南文学》新一年推出“地方”栏目,致力于从湖南本土地域中寻求新的叙事与美学风格。栏目首期以湖南作家王平的《倒拖靴故事》为主角,附带五个评论家近似闲谈的文字,构筑起人们对长沙城市文化底色的追忆与体认。《钟山》新年继续以名家专栏打造刊物的文化品格,如王彬彬的“栏杆拍遍”、雷平阳的“泥丸小记”等栏目,史料翔实又妙趣横生。

文学期刊既是一个贴近时代和生活的文学现场,也是一代代青年作家的成长园地。为推介新生力量,不少文学期刊单独开辟青年作家专栏,赋予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更多创作支持。2024年,《山花》的“开端季”栏目持续更新,第1期推出潘虹的《困鹿》、朱嘉雯的《雨林》,第2期刊发胡德江的《棺》,几部作品从叙事的不同路径通向现实生活的本真。《湖南文学》2024年第2、3期的“青年计划”栏目先后推介费晓熠、赵志远两位新锐作家,并分别请文学评论家黄德海、项静为其撰写评论,以作品与评论的对话形式塑造青年作家的创作气质。

总的来看,本次扫描的文学期刊亮点显著,它们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与富有创造性的话题引领,为乍暖还寒的2月早春吟唱了一曲报春之歌。从时代大潮到细小日常,从介入现实到形式探索,作家们以丰富的文学表达展现着多元的时代风貌,整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艺术性、在地性特点。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印象记

“家燕把巢筑在屋檐之下/它把呢喃送给人们/蜻蜓在门前栖息/它把夏天带给人/喇叭花爬上篱笆/它把歌谣唱给人们”(《故乡的歌》)。翻读湘西“85后”苗族诗人梁书正这首的时候,春日的长沙阳光灿烂,我想,此刻在湘西的梁书正,是否在拿起笔,和春风一起写诗,与阳光一同走笔。

认识梁书正是在十八洞村。当时,他作为作家代表参加了我主持的基层文学创作调研座谈会。从湘西偏僻苗寨走出来的孩子,取了一个带“书”字的名字,应该是父母对他的前途命运寄予了厚望,他却不觉间选择了文学。就像沈从文,天生注定要“从文”一样。也许是我对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刻骨铭心,那次之后,我特别关注梁书正,也是那次会议,得知他很早就和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工厂,一边打工一边写诗,年纪轻轻创作成绩不俗,成为备受关注的现象级草根诗人,还获得了《人民文学》诗歌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入选了湖南省文艺人才“三百工程”。他已出版诗集五部,其中两部分别入选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和“青春诗丛”。

梁书正的诗歌是扎根于土壤,生长在大地上的,真诚、稳重、苍翠,具有蓬勃生长的力量。“我认出了阿爸/一个和玉米一样高的人//我认出了阿妈/一个背着夕阳归来的人//我认出了女儿/五彩风车在她手中转啊转//我认出了我的故乡:妻子抱着婴儿/果实挂满枝头。”(《回乡记》)这里的玉米、夕阳,果实都与大地息息相关,如玉米高的父亲、背着夕阳的母亲、转着风车的女儿、抱着孩子的妻子,这样的乡村画面,既向上生长,又美好蓬勃。同时,梁书正的诗歌的诗意很强,他具有一种诗意的自觉,“我怀念循着羊的脚印/找到那些丢失的白云/我怀念循着牛蹄的脚印/寻到牛背上牧童的笛声/我怀念光着脚丫赶着夕阳下山/一轮满月的脚印铺满村庄。”(《脚印铺满村庄》)修辞增添了诗意,诗意营造了境界。而这种诗意自觉所形成的画面感,祥和、恬静、自在,不自觉地融入其中。这也许就是原生态的湘西给了梁书正这样的写作素材和基础,或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心的对纯朴和美的热爱与追求。梁书正的诗像一株清新葱郁的春树、一座宁静苍翠的泰山、一汪明净澄澈的湖泊。

文学源于生活,与个人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梁书正的人生路程是曲折、坎坷的,经受了太多风雨磨难。这让他的诗歌开阔、厚重,充满力量,又富有智慧。“站在沅江之畔/打捞中年苍苍的倒影/半江山川/与我互为呼应/站在武陵山顶/迎着大风而歌/整条河水/为我收拢臂弯。”(《山水吟》)这种开阔的眼界、胸襟,乃至人生的格局,借助山水抒怀,让万物开口说话。“远处/落日/是群山抛出的那一枚硬币/重复着古老而永恒的占卜”。对命运深刻的领悟和追问,增强了诗歌的厚重感。他在《捉迷藏》中写到人们在村庄里躲藏,最后陆陆续续变成星星藏到天上。他写“村寨是一个巨大的藏身之所/有些事情可以问苍天/有些事情只能问地瓜和洋芋”。苍天和大地问的是命运,那么,地瓜和洋芋问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一种了然于胸的豁达和超然,以及一种乡村古老而朴素的哲学呈现。这种源于生活的领悟,在梁书正的笔下,经由神性和灵性,达到一种古老宗教和永恒自然的大和谐。

我喜欢梁书正,不仅在于他的诗歌才华和正能量,还在于他对生活的态度。众所周知,以前的湘西是贫穷闭塞的。据梁书正讲,小时候他家特别穷困,缺吃少穿,父母去外地劳作,他小小年纪要砍柴、打猪草、放牛、煮饭等。冬天经常是光着脚走十几里山路去学校,脚冻得麻木、长满冻疮。后来他外出打工,辗转漂泊,吃尽苦头。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把他打倒,而是让他更加坚强勇敢。他的诗有这样的句子:“星星选择密集地挂在高空/让万物从尘埃中抬起头来。”这是对生活的挑战和承担。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泰戈尔也说过: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我觉得梁书正就是以这种坚强、乐观与豁达的态度对待生活的人。这种生活态度,让梁书正的诗歌博大、厚重、有温度、有情怀。

花垣县是“精准扶贫”首倡地,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梁书正,对故乡是充满热爱和恩情的。他有一组作品标题是《人间繁花》,写的是十八洞村,记录村寨的景、人和事,既接大地之气息,又有生活之甜。我记得他的诗句:“我和龙先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蜜蜂/我们要把最甜的蜜酿给人间。”在湖南省作协举办的“青山碧水新湖南”征文大赛中,梁书正打写故乡的诗歌获得了一等奖。今年,我收到梁书正的两本诗集,一本《我心满怀人世恩光》,一本《群山祈祷》,两本诗集里的很多诗歌,都是歌赞家乡、土地、祖国和人民的:“从地里长出来的/都是我们的亲人/从天空照耀下来的/都是恩情和荣光/从远处吹来的/都是喜悦和祝福。”(《好季节》)这些句子光明温暖,熠熠生辉。这个从湘西苗寨走出来的诗人,在新时代的大路上与群山同脉、与大地同脉、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共情。他的诗歌,是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情吟唱,是传递民族精神永恒的歌声。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

## 评论

# 他们永远主张春天

——评《春天送你一首诗》

□刘雨晴

2002年,《诗刊》社发起“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活动,以朗诵会、分享会、诗歌周等方式,向千家万户撒播关于春天的诗歌。《春天送你一首诗》作为其诗歌选本,以“春天”作为中心隐喻,串联起“风展红旗漫如霞”“春风识面春来信”“万物竞发听雨眠”“草树知春不久归”四辑。

以如此统一的隐喻贯穿整本诗集的做法,其实是不常见的——尽管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布鲁克斯认为,现代诗歌技巧的核心就是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隐喻不仅是一种写作技法,而且构成了我们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方式。季节性隐喻通常用于象征性地反映和表达对社会变迁、文化演进以及个体生命轨迹的深层认知。通过这种修辞策略,时代的流转、文明的起伏以及个人的生活旅程被赋予了一种周期性的象征意义,进而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些复杂现象的内在洞察力和情感体验。

“春天”作为一种典型意象,关联起“生机”“幸福”与“希望”等一切我们所能设想的美好形容。这与中国传统诗学是一脉相承的,在信仰“天人合一”的古代,春天不仅是一个时间范畴,更关系到社会伦理的方方面面。春天作为自然的表象,是四季的起点、万物的始源,具有崇高的形而上学意义,而一批诗人正在写下中华民族走向春天、走向新生的寓言。刘笑伟《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精确勾勒出中国所处的“启程时刻”:

“南国的椰林、木棉,在热气腾腾的早晨/一一苏醒,成为春天史诗的一部分”;高鹏程《蔚蓝》通过章节结构试图形成与历史的对位,从“司晨的鸥鸟衔出东方的第一缕曙光”,到“一艘东方巨轮,再次拉响了它远航的汽笛”,中国“是如此古老却又从不老去”;杨碧薇《北京春天》从侧写的角度摄下城市的灵晕时刻,“多久过去:天空、福祉、尘世的匕首”,同时以伤春的情绪慨叹时光易逝,“这些魔幻的生长将魔幻地消失,这些丰富的层次,会很快被削平”,然而,诗歌本身却用文字的时间刺穿了匀速流转的时间,于是成为永恒的“绚烂中的悲、深海里的静”。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春天是“青春”与“激情”的代名词,标志着确立新秩序的决心。自新诗受到西方现代诗的影响后,“春天”才附带上诸如反叛与怀疑的语义,这一意涵其实是颇具现代性意味的。四川《开花》一诗不断重复“开花”一词,以韵律的节奏展现出“开花”的动势,具有速度感与爆破感,携带着冲击稳定秩序的自由精神:“开花就是解放开花就是革命/一个宇宙的诞生不始于一枚爆炸而始于一朵花开”;李少君《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一诗则使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前半首竭力铺陈压抑的氛围:“暖气催眠的昏睡”“冬寒仍不甘退却”“沉沉夜雾”……然而到最后两段,诗歌基调却陡然上扬,“应该向大地发射一只只燕子的令箭/应该

向天空吹奏起高亢嘹亮的笛音”,直至“浮现明媚的春光/让一缕一缕的云彩,铺展到整个世界”,这使人直接联想穆旦所提出的“新的抒情”,即那种“伴着内容所应有的情绪的节奏”、那种“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也有部分诗人以“倒悬的”或“反面的”姿势闯入春天,展现出反叛与合作的性格,然而这在无形中却又呼应了真正的“春天”精神,如林秀美的《倒悬的春天》与育邦的《当春天来时……》两首,前者向外找寻灵魂的安放之地:“这大地上下垂的柳枝/用真诚而虚空的触觉/在更高处 或者/让怜悯和疼痛垂下/让灵魂/更明亮更高远”,后者则向内构建起内心的国度:“当春天来时,我们走到春天的反面./在我的私人国度.在我的花园”。

对于个体而言,“春天”则包含了复杂的情感结构,意味着潜意识里生命欲望的点燃。春天的氛围是温暖的、萌动的,而我们对春天的切身感受会激发出一种身体意识,即渴望重新确证自由的意志,无论是通过爱或被爱,还是通过生存或毁灭。在欧阳江河的《春之声》里,春天是“阳光灼烧的脊背”,也是“梦中到来的大海”,身体感官与心理意象形成紧密的通感式联结:“我紧紧压住的胸口/在经历了冬眠和干旱之后,又将经历/爱情的滚滚洪水和一束玫瑰”;而在何向阳的《原因》里,只有在“坚持发芽”的春天,才会使诗人悬置一切对先验的反思、对哲学

的谈论,世间的“原因”不在于思维,而在于每个切身感受的、心动的时分:“爱人/把手放在心的位置/回答我/春天为什么叫做春天呢”。在于坚的《整个春天……》里,春天是新生的、来自他者的召唤,在春天的躁动里,“我”始终满怀弗洛伊德式的“期待的焦虑”:“整个春天我都等待着他们来叫我/我想他们会来叫我/整个春天我忐忑不安”;而在吉狄马加的《又一个春天》里,春天是“轮回的胜利”,死亡等同于新生:“当我意识到唯有死亡/才能孕育这焕然一新季节的那一刻,不为自己只为生命/我的双眼含满泪水”。

然而我们最终可以发现,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个体的角度,“春天”的隐喻都包含了同样的所指:人之为人的主动性。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到,文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自我调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主动性和自我反思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在社会日益倦怠化、分众化与碎片化的当下,这批诗人却试图召唤一种“新的主流”,一种集体的觉醒和姿态去迎接生活的质询,留下逆行的痕迹,这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葆有希望比绝望更有勇气。

因此我说,春天是一种主张,他们永远主张春天。

(作者系诗评家)



《春天送你一首诗》,诗刊社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 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我社已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岳雯、路斐斐、许婉霓、教鹤然、罗建森、刘鹏波、杨茹涵。

公示期2024年4月29日—5月5日。举报电话为010-65913314,010-83138953。

《文艺报》社  
2024年4月29日